

# 世界文化論壇 Culture Communication

## 中國與生態文明

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院长 小约翰·柯布 博士 柯进华 译

中国政府宣布，中国的目标是建设一种生态的文明。这是历史性的一步。当然，宣称一种目标并不能保证能成功地实现它。一些批评指出，中国的生态文明的严重性在世界各国中是名列前茅的，中国的有些政策和行动并不是朝向所宣称的方向。但这些现实并不能抹杀这一声明的重要性。

宣布这一目标是为了激发关于中国如何能够明确具体地转向这一方向的严肃探讨。这样的探讨往往可能是批判性的，但这些都是有益的。并且，这意味着政府不仅鼓励有关这一主题的研究、出版发行和会议，还鼓励运用于实践的可行性的建议。

当前有一些国家比中国更接近生态文明的理念。有一些国家某些方面的政策更好。但据我所知，只有中国迈出了这重要的一步——中国宣布了这一步目标。显然，我自己的国家美国离这一步还很遥远。积极领导世界的机会现在属于中国，世界急需这样的领导。

我所在的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一直与中国的有识之士们一起合作来加深对生态文明的思考。在加州的克莱蒙市，我们从2006年以来，每年都举办着一个以生态文明为主题的学术论坛。每年都有几十位中国学者参加这个年度论坛。这表明了美国对这个问题的兴趣。而这在美国的任何地方都是不可能发生的。鉴于我们的国家和国内的大多数机构支持的恰与生态文明的准则和目标截然相反；并且往往依旧表现得越发糟糕，因而我常常感到我们也许没有什么东西能贡献给中国的客人。

很多美国人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已经觉察到，我们的文化准则和实践与维持他们的有限的环境承载力之间的鲜明矛盾。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早期的一段短暂的时期内，更广泛的公众和政府对于这一觉醒作出了积极的回应。后来，公司发现所提倡的这一变化会减少他们的利润，他们就组织起来阻止和逆转这一进程。他们成功了！美国领导人正在催促世界为了短期的公司利润而走向自我毁灭。

另一方面，那些数百万觉醒了的人们仍然是觉醒的，他们中的许多人一直坚持思考和投身于反思与实践生态文明的运动之中。

也许，我们长期的（和正在输掉的）、反抗错误的理念和毁灭性的实践的斗争澄清和改进了我们的思考。我们可以贡献很多理念，但在美国国内，我们没有机会广泛地去分享它们。如果说它们在未来有可能被实践，这将在中国。至少在原则上，并且很大程度上在实践上是如此，中国致力于生态的文明使中国向这些理念开放。中国的兴趣为我们提供了机遇，使北美人聚集起来思考和投身于一个在我们自己的国家没有什么地位的目标。

例如，中国人对生态经济学的兴趣使我们有理由举办一个生态经济学的会议。尽管我致力于生态经济学的研究已经有40年了，这是第一次有这样的机会来举办这样一个会议。我不能确定这个会议会对中国有什么影响，但它在美国和加拿大的确增进了反思。特别地，它引发了美国和加拿大两个团体的思想家们对经济作进一步的探讨。

在这个会议上，一些生态经济学家们指出了将制造货币交给私人银行人的巨大毁灭性后果；另一些学者则提出我们需要建构一种反对以无止境的增长为中心的经济理论。前者表明，如果政府重新赢得控制货币制造的权力并用它增强了经济能力去服务大众的福祉，那么经济整体将会繁荣；后者则表明，只要塑造政策的经济理论以全球的产品和消费的增长为首要目标，我们的民族和整个世界将走向一条完全不可持续的道路。因此，前者向我们表明了我们可以如何继续增长，尽管这一增长还远远不是以共同的福祉为导向；而后者则认为，增长不能成为我们的目标。中国有兴趣对经济作根本的反思，这使得北美的这些学者能够聚集在一起并制定一个能够满足双方的关切的立场。

目前，这一思想对美国的公共政策和我们大学里的经济学的教学方式没有影响。同样的，中国也远没有抛弃其现代经济增长的观念。因而，一种关于生态文明的正确的经济远见仍然与实际的国家政策、甚至与有影响的圈子内的当前讨论相脱节。然而，中国更有前景。中国的政府正控制着绝大部分的货币制造。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中国政府在使用这一权力去广泛分配增长的福利，而不是将福利集中在一小撮人的手里。我们希望，通过指出给予私人银行特权的可怕后果将增强中国远离全球金融体系的决心，并很好地运用其占优势的体系。

另外，中国已经认识到，以GDP来衡量经济发展是极其误导性的，中国正在运用其他的、更实际的衡量标准。这为从“增长”为导向的经济转向以寻求人民的可持续福祉的经济提供了可能。指导这一转型所需的经济理论已经在北美的生态经济学极边缘的地带得到很大程度的发展。

我们北美的许多人认识到，一种生态的经济是在当地就能获得必需品甚至其他商品的经济。这与美国的公司所要求的全球经济是对立的。中国已经能够以惊人的速度开发全球经济来成为一个强大的工业力量。如果中国要变成一种生态的文明，中国将需要改变其绝大多数的外出口产品为当地内销。中国需要在全国内更均衡地分配产品。这一转型将是巨大的和极其困难的，但越早充分地认识到这一转变，中国越有把握在不可避免的全球经济崩溃之前走上一条好的道路，不幸的是，中国目前这种全球经济非常依赖。

也许其重要性仅次于生态经济的是生态农业。事实上，生态农业甚至可能更重要。但无论如何，两者都无法彼此分离。在美国，农业是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在大学里被教学和在我们的土地上被实践的。值得庆幸的是，数千、也许数百万的人们对其后果表示扼腕叹息。这些人想告诫中国不要走美国的农业工业化之路。正是由于美国这里的情形如此糟糕，这里也有了更多密集型的生态农业。中国可以从中汲取经验。重要的是，中国直接从小规模的农民农场转向小规模的生态农场。中国和世界都无法承受中国农业的工业化。

中国对生态文明的兴趣也激发了我们对生态文化和生态精神的思考。中国在工业化上所取得的卓越成就鼓舞了消费主义在文化和精神上的胜利。我们这些居住在美国的人们长期以来一直生活在消费文化的诅咒之下。因此，我们这些反对消费文化的人们可能对那些看到了消费文化阻碍生态经济和生态农业的发展的中国人有所助益。在北美，我们没能成功遏制消费主义的潮流。但也许致力于成为一种生态的文明的中国，结合中

国古代的智慧，能够在为时已晚前遏制住消费主义的潮流。

中国自古就知道幸福更多地来自于关系，人际关系和人与大自然的关系，而不是来自于占有那些并不是真正需要的东西。中国古典思想的复兴有着深远的益处。在全世界反对消费主义和全球经济的人群中，中国的传统智慧受到赞赏。这一赞赏能够支持和增强中国那些寻求以批判性的方式复兴与当前现实相关的中国精神的人们。

几千年以来，中国高度重视教育。这种教育浓厚地以价值观为导向。通过教育，一代人的价值观传承给下一代。这给予中国文明突出的稳定力量。由于这些包括了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的价值观念，中国社会相对可持续，这些价值观的复兴将对生态的文明有重大的贡献。然而，教育的现代化掏空了古典价值观的传承，并且弱化了消费主义的抵制。

此外，现代教育是为城市服务的，而不是为改善农民的环境服务的。从这方面来说，今天中国的教育也是现代性的产物。这种教育的结果就是导致中国的农民和他们的子女想抛弃他们的田园并移居城市。现代教育在世界所有地方都有这种影响。城市的诱惑部分是经济上的，这种情况也可以应当通过使务农更有利可图来逆转。但这也反映了几乎所有教育的价值内涵。学校教育并没有传达农民的智慧或者颂扬农民对土壤和气候的理解。由于忽视所有这些，学校教育使学生认为真正有价值的是与城市生活有关的知识。

## 本期主要内容

中国与生态文明	第1版
全球视野下的中国生态农业（上）	第1版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与教育改革	第2版
探索中国教育改革的另一种进路	第2版
简约线性城市：后现代城市化的一种可能	第3版
南加州有个“桃花源”	第3版
倾听通灵者的言说	第3版
倾听儿童	第4版
“洋孝子”凯文	第4版

##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国际会议在哈工大成功召开

2012年6月10-11日，由哈尔滨工业大学人文学院、经济管理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哈工大建设性后现代研究中心和美国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美国克莱蒙林肯大学以及美国过程研究中心中国部联合举办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哈工大校史馆礼堂隆重举行。这是中国大陆地区首次举行有关“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与中国”主题的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

世界著名过程哲学家、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曾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的大卫·格里芬博士（David Ray Griffin）亲临大会做主题发言。会议引起黑龙江省委和哈工大领导的高度重视。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张强、哈工大校长王树国，校长助理安实以及人文学院院长杨超等领导莅临会议，张强部长和王树国校长分别致欢迎辞。来自美国的著名后现代专家及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黑龙江大学、哈尔滨师范大学等众多国内知名学者也参加了此次盛会。

除了格里芬博士做了精彩的主题报告“生态危机：中国能否拯救文明”外；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副校长，博士生导师程伟教授做了“后现代视野下的大生态医学模式”的主题报告；美国克莱蒙林肯大学常务校长、哈尔滨工业大学首席学术顾问费利普·克莱顿（Philip Clayton）做了题为“后现代科学，后现代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生态文明：如何避免西方现代性的错误？”的主题报告，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刘孝廷教授做了题为“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国际会议会场

论建设性的学理机制”，哈工大建设性后现代研究中心王治河教授做了“第二次启蒙呼唤一种厚道文明”的主题报告；做大会发言的还有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政法学院院长，北京过程思维研究中心主任杨富斌教授、哈工大叶平教授、解保军教授、樊美筠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郭海鹏教授等众多学者，话题涉及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哲学依据、过程哲学的基本特征、怀特海过程美学思想、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与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工业发展之间的复杂关系等很多领域和学科。

最后，此次论坛美方代表克莱顿教授以及中方代表刘孝廷教授进行了大会总结，认为此次会议是一次成功的会议，对东道主哈尔滨工业大学选择“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与中国”这样一个重要主题表示钦佩。如果按照现代的说法，真正有价值的思想往往产生于边缘的话，那此次会议开在地处边陲的哈工大，其意义则是深远的，它具有某种第二次启蒙的意义。杨超院长代表东道主对参加会议的各位来宾表示诚挚的敬意和致谢。他认为，此次论坛的召开不仅有助于建设性后现代理论的进一步拓展，而且在唤醒国人的生态危机意识，使中国避免重蹈西式现代化的覆辙以及探索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后现代发展之路方面，都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李璇）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建设性后现代研究中心”在东南大学成立

“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与当代社会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2012年6月16-17日在东南大学召开。来自美国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美国汉瑞克学院新视野研究中心主任迈克丹尼尔教授（Jay McDaniel）、南京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张异宾教授、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治河教授、东大社会科学处邱斌处长、东大马克思主义学院常务副院长袁久红教授，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项目主任樊美筠教授等出席了会议并做了发言。东南大学沈炯副校长主持，郭广银书记致辞。美国过程研究中心主任，著名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大

## 全球视野下的中国生态农业（上）

——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克里福·柯布著 成文杰译 谢琼校

### 引言：不只是耕种

当我们提到生态农业时，首先倾向于想到种子、土壤、肥料和一些天然的控制害虫的方法。生态农业这一主题似乎被定义为在农业中减少环境破坏的方法：如何使用更少剂量的化学农药和肥料，如何控制土壤侵蚀，如何种植互有益的农作物，例如豆类 and 谷物，如何轮作农作物，以及如何实施综合的农场管理。这是一个相当美好的生态农业的远景，也是美国大多数有机农场所例证示范的景象。

然而，英文单词“ecological”还有其它含义，它是关于在任何一个复杂系统中各种关系的学问。这就是我在本文中用这个单词的含义。因此，生态农业比农耕层面的活动要宽泛得多。这个系统涉及的范围从地区文化到全球贸易，从哲学到经济学，从家庭之间的关系到国家之间的关系。除非我们有一个思想体系指导我们协调所有的价值观，否则我们仍将创建一个不平衡的农业系统。即便是所有农民都采用合理的环境技术，这种不平衡的农业系统还是会造社会性的破坏。

生态农业最大障碍是现代哲学。无论是在美国还是中国，都流行这样一种观念，即现代的总是较好的，科技能解决一切问题。但是任何技术或实践方法只适用于某一特定的场合，在某些情形下的进步可能成为另一新情形下的社会问题。人们对每项新技术都普遍充满信心，这使现代化可能轻易地成为一种幼稚的信仰形式，在这种信仰中，人类不仅自我崇拜，也将人类的发明物置于膜拜地位。

对于形成生态农业来说，最需要的是采用平衡哲学。我们可以在传统的中国哲学中找到这种哲理，譬如道教、中庸、阴阳论和新儒家思想。同样，我们也可以在西方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思想中找到这种哲理。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思想既结合现代科学又尊重传统，更重要的是，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教导我们审视全局，而不仅仅是那些关于现代思想的现实碎片。

相较于以抽象的形式讨论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我更乐于以哲学范例的形式来展现关于生态农业的观点。适用于生态农业的哲学，其关键要素是：1) 过程重于结果、系统重于元件；2) 非线性或间接的因果关系；3) 所有科学知识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4) 相对主义——多角度的有效性；5) 所有财产的权利和义务的相对性。这样，为了明白如何实现生态农业，我们必须正视大型系统如何影响小系统的行为，寻找复杂的因果关系网络，质询应用于农业的已被认可的科学观念，关注众多不同的知识体系，特别是农民的傳統认识，并寻找使土地使用权既不完全属于公共也完全落于私人的方法。简言之，我们必须从包容性的系统出发，再收敛聚焦，而不是从最低级的现代生化农业出发，再向外扩散。

### 全球体系

#### A. 全球生态系统

在全球化的世界，国家间没有明确的界限。例如，每个国家都依赖大气和气候的调节。因此，近期最直接影响中国农业的全球性问题是气候变化。全球气温上升将导致中国某些地区风暴灾害加剧而其他地区降雨量减少，导致中亚地区冰川收缩而引起河水流量减少，导致更严重的气象条件变异性，并削弱了人们对携带登革热、疟疾、黄热病蚊子的抵抗力。所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将导致农业收成低于当前大部分农业分析家的预期。目前，环境损害已经消耗了中国经济8%-10%的国内生产总值，或者每年3-4亿元人民币。气候变化的成本（包括：洪水、干旱、疾病、虫害、以及有益物种的减少）是极其高的。2005年到2011年的五年干旱，应该作为对那些分析家们的一个警示，因为他们相信在未来急需用水的地方，水的供给将不会急剧下降。如果中国的灌溉用水随着气候的变化而急剧下降，中国将很难维持充足的粮食供应。同时，由于食物生产的微量减少都会导致粮食价格的大幅上涨，这可能会给国民经济造成严重的负担，并可能导致大范围的饥荒。

在全球生态系统中，各国共享资源并从中受益，中国仅仅是其中的一员。中国从中受益，其他国家也是如此。同时，中国和其他国家也将因未能有效管理全球生态系统而遭受苦难。工业化国家由于大量排放二氧化碳和甲烷而使气候改变，结果造成了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粮食短缺的天气模式。世界各地海洋和陆地的生物多样性，也由于过度捕捞、水质污染和土壤侵蚀而减少了。世界低成本的石油已经消耗殆尽，只留下高成本的石油储量以供将来使用，这将提高日益增长的食品和物流运输的成本。所有这些都将影响中国农业的未来，即便是中国不会对这些因素拥有直接管辖权。

因为全球生态系统是无序的，其价值要么因过度使用而被浪费（如大气或海洋渔业），要么被私有化，就像目前企业正在将大气私有化（根据京都议定书框架下的碳交易计划）和渔业私有化（国家捕鱼许可证）一样，它们一度按照帝国主义的合资方式将世界石油和矿产资源私有化了。事实上，世界上肥沃的土地过去也是被侵略性地瓜分的，而不是通过某种公平的方式分配的。北美、俄罗斯、加拿大和阿根廷的人民享有超过其平均份额的世界富饶的土地，正如沙特拉伯拥有超过其平均份额的石油一样。在拥有一个公平地分享地球资源的方法之前，生态农业难以实现，因为全球生态系统将是一个不公正、紧张和滥用的源泉。

地下水就是国际间公共资源管理不善的例证。美国允许蓄拉加蓄水层枯竭的做法正危及着食品安全，这个蓄水层是世界上最大的蓄水层，它跨越整个小麦种植平原。德克萨斯州北部的许多灌溉农田已经失去了供应水。自1950年以来这个蓄水层已经缩水了9%。由于地下水的储量估值是根据地表水位的临近值测算的，蓄水层水位的下降已超过了9%。按照目前的消耗速度，它

将在未来几十年内完全枯竭。中国的华北平原蓄水层亦是如此。随着山东、河北、河南和陕西地下水的枯竭，小麦持续生长的能力将会下降，一些地区的水将会在30年内消耗殆尽。尽管在美国和中国的干旱地区，水资源是收费的，但水的使用依然十分浪费，完全不考虑未来生产足够粮食的能力。那么这两个国家不能管理自己境内的公共资源，那么，管理公共资源的国际协议又如何才能生效呢？

#### B. 粮食，贸易和食品价格

中国未来的粮食供应也逐渐取决于其他国家的农业政策行为。五十年前，非洲的一个粮食净出口国，而现在却依赖进口。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面临同样的情形。由于越来越多的国家依赖于美国、加拿大、俄罗斯、阿根廷和南非的食品供给，由此造成的供求失衡将影响中国的未来。让我们思考一下：如何将中国的农业体系与其他国家的农业和土地使用政策联系起来。2010年，中国食品价格上涨10%，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涨幅。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实现粮食自给，这是因为政府的合法性确实依赖于解决饥饿问题。去年价格突然上涨，部分原因在于生产水果和蔬菜的地区发生了洪涝，导致这些商品价格上涨了62%。

中国食品价格上涨的另一个原因是世界粮食市场。由于粮食需求相对价格是缺乏弹性的，粮食供应的微量减少就会导致世界粮食价格的大幅上涨。例如，2010年的全球小麦产量比预期水平低4%，就导致价格上涨了50%。2010年中国的粮食净进口增长了120%。虽然中国政府进行了粮食储备，但是中国在应对世界市场方面的脆弱性不会越来越明显，特别是对于中国肉类和酒类消费不断增加的情况下。由于香港的人均肉类消费量比大陆大约高出2.6倍，我们有理由认为中国的粮食需求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无限增长下去。

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决策支持系统工程，是一个由中国科学院和一些著名的欧洲科研机构参与开发的相对保守的系统，连这个系统都提出未来中国对进口食品的依赖将会增加。这项研究预计，中国60%的肉类消费增加将需要增加900%的粮食进口——从3百万吨增加到3千万吨。这项研究的假设是过于乐观的。此时，我只想指出，粮食进口就是只增长这900%，中国在国际粮食价波动面前就够受的了。

为了避免这种脆弱性，中国已开始研究长期租赁莫桑比克、苏丹和非洲其他地区的土地和水的可行性。问题是这些租约将造成严重的国际紧张局势，因为非洲人民将怨恨外国对他们资源的控制，特别是水。迄今为止，中国农业部已经开始勉为其难地全力争取非洲的土地和水的权利。然而，当国内的农业不能满足人们膳食纤维需求的问题越来越明显时，中国的压力将会演变为干预非洲。

即使中国不直接参与非洲的农业项目，生态农业的发展仍将是一个国际问题，而非在任一

的边界之内可以单独解决的问题。中国的内部稳定依赖于其他国家的食品安全，因为任何其他地区的歉收都可能导致中国食品价格的急剧上涨。因此，巴西、加纳或肯尼亚关于将农民和土地分离、以咖啡和茶叶等出口作物替代本地食品消费的政策，将会影响中国的未来。这意味着，要实现以生态健康的方式来解决中国人民的膳食问题，不仅是中国如何自我发展经济的问题，更是中国如何帮助其他国家实现其发展目标的问题。我主张推行一个巨大的计划——告诉世界各国：中国是如何通过土地再分配、公平竞争、鼓励生产与政治稳定来实现高度的粮食自给的。在一个中立的政治环境中推行这些观念是十分艰难，更何况世界上还总有那么几股强权力量不希望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实现粮食安全和政治自治。

美国新殖民主义的目的在于使其他国家依赖美国的粮食供应，中国为提高发展中国家粮食安全所作的任何事情，都是对美新殖民主义者的直接挑战。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就将粮食出口作为一个潜在的武器。美国迫使发展中国家依赖其粮食供应，有两个目的：1) 影响外国政府；2) 增加美国粮食贸易商的利润。美国两大综合性企业集团，美国嘉吉集团和阿彻丹尼尔斯米德兰集团控制了世界75%的粮食贸易量。他们的利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其他国家的粮食销量，基于他们的政治影响力，美国政府和世界银行促进了发展中国家咖啡、茶叶和可可粉的生产，以及其他非食品商品的生产，但并未促进这些国家国内消费的粮食的出口。这导致许多国家在满足粮食基本需求方面完全依赖于美国企业。

更阴险的是，美国将其军方的世界气象控制项目作为一种军事和政治控制的手段。这些项目在2003年到2006年期间一直在试验中，一位研究人员认为它们可能是造成近年来的极端天气事件的因素。古巴和北朝鲜的干旱和洪水过度肆虐已十分严重，表明这些事件可能是人类为制造的产物，而非由纯粹的自然因素所引起。粮食贸易和粮食安全政策已开始具有地缘政治的性质，类似于石油和水资源的争夺。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希望实现国内和谐的国家将不得不全力合作以抵制这种不合理的全球粮食供应体系。为了避免资源被其他国家开发，为了让人民不挨饿，怎么做都是不过分的。中国需要向那些无视国际国内公平正义的国家发出挑战。从其他国家获得石油、矿藏和水所产生的短期利益，可能会使全球长期的不稳定所抵消，这也将影响未来几十年的粮食贸易。

因此，要理解农业和食品政策，需要掌握土地栽培、畜牧、灌溉等更多的专业知识。生态农业是一个需要透过全球视角观察才能理解的事业。（未完待续）

## 征稿啓示

《世界文化論壇》由中美後現代發展研究院（美國）主辦。面向兩岸三地及美國華人世界，旨在促進中西文化交流，增進世界和平和人類共同福祉。

本報有以下欄目：文化廣場、放眼天下、美國大觀、洛城夜話、企業文化、思考手記、過程思維、綠燈人生、成功之道、大師風範、華人明星榜、信仰的天空、名校推薦（廣告），互動特區，影響我一生的一本書，影響我一生的一句話，特色店（廣告）等。

歡迎兩岸三地、美國及世界各地的華人踴躍投稿。稿件最好控制在1500字內。潤筆費千字10-20美元。

## 《世界文化論壇》報學術委員會

（以姓氏筆劃為序）

丁子江 任平 成長春 劉孝廷 劉笑敢 劉全華 曲耀厚  
李晨陽 李惠斌 陳俊偉 吳國盛 陳榮灼 楊富斌 金惠敏  
歐陽康 俞懿嫻 顧林玉 唐力權 鞠實兒 安乐哲

## 《世界文化論壇》報

主編：樊美筠  
編委：王治河 王蓉蓉 朱易 倪培民  
謝文郁 曾慶華 黃勇 馮毅  
顧問：葉秀山 叶明 朱德生 周桂钿 乐黛云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与全球化时代的教育改革

[美] 克莱蒙林肯大学常务校长 菲利普·克莱顿博士 柯进华 译

在我年轻的时候，我以为所有的父亲都像我的父亲一样。事实上，我无法想象作父亲的任何其他方式。我父亲很严格，对我要求很高，他希望我努力工作。他并不谈论他自己的感受；他喜欢谈论理念。但并不喜欢聆听。当我们在家里一起坐在餐桌旁，他大多数时候都在滔滔不绝。当他不在的时候，我们就得多说许多话。有时，我们更喜欢后一种情况。我从对话中学到的要比从“一言堂”学到的多。

许多学校就像我家的餐桌，许多教师就像我的父亲。我们通过演讲来教学。学生通过听课来学习。一个人支配，其他人服从。我们教育了心智，但我们并没有教育整个的人。而且，我们经常无法想象事情可以是不同的。这里我想探讨一下不同的教育模式背后的预设。然后我会将它与美国教育改革的预设作对比。这两种预设十分不同，因为它们表达了两不同的世界观。我称它们为西方现代主义的世界观和建设性后现代新世界观。当人们反对教育改革时，我认为这是因为这两种世界观十分不同，人们无法去设想改变他们对课堂的思考方式。但理论和实践是密切关联的。建设性后现代理论营造一种能进行转变性学习的课堂氛围，其结果是一种令人兴奋的新的教育实践之路。

现代主义的黑夜和后现代的黎明

欧洲是一个美丽的地方，现代欧洲的世界观的一些产物是积极的。比如，我们都赞赏科学、全球思维、健康的经济。当然，欧洲的思想家们也提出了中国人用以建设他们自己的社会和政治体制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但欧洲近500年来所发展的世界观有很严重的问题。我感到它应当对当今教育中的许多问题负责。

原因很简单。欧洲现代主义是建立在三个简单的理念之上：个人主义、竞争和不能将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与传统中国社会将家庭、村庄或民族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相对，欧洲人将个人作为价值的源泉。个人主义培养了竞争。哲学家约翰·洛克将个人定义为拥有私有财产的人。它预设了每个财产的拥有者们都试图积聚更多的财产。但显然不足以让每个人都拥有他想要的所有东西。谁来为每个人可以拥有多少划定界限？谁来阻止欺骗？在现代欧洲哲学家看来，国家存在的目的仅仅在于此。他们认为，国家不需要追求人民的福祉，因为资本主义——追求财富——是确保最大多数的人民幸福的一种更好的方式。

现代欧洲的教育体系就是围绕这些价值而建立的。其目标是培养好的消费者和好的财产拥有者。比如，考察一下英国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的教育体制。年少的男孩们在6岁时便被送往学费十

分昂贵的私立学校。他们在没有亲人、面对着重课业上和运动场上极端竞争的环境下长大。他们生存的唯一方式是在大男孩团体中寻找保护。英国为什么让他们的高年级男孩有这样极端的待遇？统治阶层认为，这种教育是英国的海外服务的理想准备。因为他们在很小的时候离开他们的家庭，这些男孩愿意在世界任何地方生活。他们非常有竞争力、自立和忠于他们的阶层。这使他们成为理想的行政官员，比如英国人对印度150年的统治。

我很小的时候曾生活在英国，亲身体验了这一教育体制。老师会体罚学生。男孩和女孩分开。教练要我们玩暴力的运动，如橄榄球运动，因为他们认为这能使我们无所畏惧。我们通过相互竞争通过“A”级考试，这样我们就能去牛津或剑桥。他们说，“愿最好的胜出”。这种竞争的环境使得形成一个学习型的团体变得不可能。我们不互相帮助，因为每个人都想成为获胜者。

后现代教育理论

幸运的是，一种新的世界观正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这就是建设性后现代世界。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认识到地球上的资源是十分有限的。人类面临的全球问题只有通过共同合作才能解决。中国人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使用了一种后现代的表达：“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因为这个世界如此小，我们必须为了整个地球而像服务于一个单一梦想的单一共同体那样共同合作。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颠覆了现代主义哲学的各个方面。与将个人放在第一位相反，我们将共同体和地球放在第一位；与将竞争放在首位相反，我们将合作放在首位；与相信通过追求财富来造福社会相反，我们要求国家为人民的利益服务，把对财富的追求放在社会的福祉和地球的福祉后面。

这些变化如何影响教育？让我们回到我前面举的例子，英国的公共教育。我们颠覆这一现代主义模式的所有特征。我们不会为了孩子们的所谓成功而使他们离开家庭；我们运用家庭单位作为课堂学习的首要支撑。我们不会用体育或者体罚作为手段来使学生们的个疲惫不堪；我们运用运动来使孩子们学习如何在团队中高效地共同合作。最后，我们的目标不是“人人为自己”和“让最好的胜出！”；而是“团结使我们更强”。传统的非洲社会用“乌班图”(Ubuntu)来表达这一概念。“乌班图”指“大家强烈我强”。

希拉里·克林顿在几年前写过一本很好的、有关后现代教育的书。她的书有一个很好的名字《举全村之力》(It takes a village)。她解释这个书名的意思是：非洲谚语“养一个孩子需举全村之力”。她

强调：不管你是否喜欢，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我们的孩子从世界中听到、看到、感觉到和学到的都将影响他们的成长以及他们将来会成为什么样的。自9/11以来的5年增强了我一个主要的观点：孩子在任何地方被养育的方式都会影响我们的生活以及孩子的未来。

她说：“家庭不应该与教育分离；相反，家是孩子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课堂。”克林顿女士使用了一个很有力的例子：

美国的许多学校都正在吸收关于同情心和自我修养的教导——社会理论家们称之为“素质教育”——到他们的课程。在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市，一种社会发展的方法正被整合到每所公立学校的孩子们的日常课程中。孩子们学习技术来发展和提高社会技能、识别和管理情绪、比一项显，以及创造性地解决问题。这一项目显著地提高了分数又改善了行为。

克林顿女士强调的“素质教育”显然十分不同于现代的方法，后者排他性地追求知识。事实上，克林顿女士所写的正是美国非常典型的后现代课程改革。举个例子，她强调发展社会技能。一个成功的人是一个能够在社会上与他人合作的人。这涉及掌握一个人的情绪和在团队中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这里对着中国听众讲述这些主题我几乎有些不安。毕竟正如大家所知道的，素质发展和掌控一个人的情绪是中国的孔子思想的基本主题。孔子说，“一个真诚、上进和友善的人可以称为是有教育的一——对朋友真诚，自己上进，对他的兄弟友爱。”孔子还有一次说，“有教无类”，因为“所有受过教育的人都是同等的。”因此，孔子可能是后现代教育哲学之父。

后现代教育理论在欧洲和全美都有很强的影响力，我听说它在中国的影响也正在增长。后现代教育家们有着仅仅只是精通一门学科的内容更广阔的目标。他们寻求培养负责任的公民和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的人——能独立思考的男孩和女孩。他们不只是培养智力，他们更重要的是培养人格。

后现代教育理论的创建者：怀特海

根据后现代教育理论，学习不只是获得数据资料。学习关乎个人的转化。首先，教师在课堂上营造出一个安全的环境。然后她跟学生交流创造性价值、开放思想以及有关发现的兴奋。关注的重点不是在未来而在当下。与一种新的经验、观念、故事或者理论相遇的当下是一个神圣的时刻。哈佛大学哲学家怀特海曾说，当下的学习是“神圣的基础”。

让我稍微讲讲怀特海，他是第一个后现代教育哲学家。怀特海关于教育的名著是《教育的目的》。他在其中写

道，“教育是学习运用知识的艺术。”这个句子表达了他的哲学的一个核心观念：教育不能与实践相分离。去获得知识、了解事实，这还不是教育。教育只在学生能够运用他们的新知识时发生。教育关乎能运用知识去做事。教育只有在学生的交谈、探索和行动中发生。

所有的教育经验都由学习者一定的感情投入开始。学习和兴奋相伴相随。在西方我们称这种兴奋为“尤里卡时刻”(eureka moment指灵光一现)，它来自古希腊语，意思是“我发现了！”这一表述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家阿基米德。跟往常一样，阿基米德正准备踏进池水满满的公共浴池。当他踏进浴场时，他看到水面上升。他突然想到，排出的水的体积和浸没在水里的物体的体积相等。现在他知道如何去测量不规则固体的体积了，这是一个之前没人能够解决的难题。根据传说，阿基米德从浴池里跳了出来，在他的城市锡拉库扎的大街上奔跑，一边大喊“尤里卡，尤里卡！”——“我发现了，我发现了！”

这一发现的时刻是后现代教育的核心；这是学习的第一阶段。怀特海称这一阶段为浪漫阶段。怀特海说，随后出现的是第二阶段，精确阶段。不幸的是，我们常常首先要求精确性而忽视了发现的时刻。怀特海叫我们先推迟“系统阐述的精确性”。

怀特海后现代教育理论的最后阶段是综合运用阶段。这一阶段是指一个人具备了综合运用能力，将所学运用于新的情况。这一重要的技能不能通过死记硬背来习得，因为这是一种你只能通过动手来做来习得的能力。事实上，学生通常是在社会处境下，在和其他学生的合作中学习综合运用的。这就是为什么“学习共同体”在后现代教育中如此重要的原因。

怀特海是后现代教育理论的创立者还因为他强调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性。你也许会说他怀特海是一个道家：理论和实践，一阴一阳，而教育是“道”。事实上，怀特海不只是考虑孩子的教育；他同样多地将他道家理论运用于大学。他写道：

大学不只是训练分析和思维技能，而且还包括将学生们的丰富想象力整合到生活中。所有大学的活动中有一个创造性的因素（并且不只是好的艺术），一种在充满危险的变化的世界中生存下来所必需的创造性。

怀特海还在后来的一部著作中写道，“大学的任务是创造未来。”

后现代课程改革

那么，后现代教育是什么样的呢？在世界范围的许多学校中，思想前卫的课堂和学校管理人员正在创建取代旧教学模式的方案。现在通过考试来检验学生的进步只起到更小的作用。三个核心理念是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形

成学习共同体和关注学生的积极参与和创造性。

就人文科学来说，这意味着学生不只是阅读经典文本。他们也有机会写作他们自己创作的散文、短篇小说和诗歌。他们和同学分享自己的作品，并且他们学着给出建设性的反馈意见。从11岁开始，学生一起写作剧本并表演它们。在11岁前，他们在课堂上做角色扮演，然后谈论他们所学到的。在学期的期末，他们不止是参加考试。他们还提交自己的“代表作”并展出他们的所学。

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也在发生教育改革。这些改变被称为“STEM创新”(STEM initiatives, 即科学、技术、工程与数学的创新)。STEM是四个英文单词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的缩写。比如，在旧金山地区的STEM创新(它是一个很大的华人社区)通过运用数学技能来解决日常困难来教授数学。学生不只是被要求识记和运用数学理论；他们还要用创造性的方式来发现数学定理。

后现代的科学研究尤其令人兴奋。现在的重点在于学习运用科学的方法而不是死记硬背科学的结论。总之，伟大的科学家和工程师都是发现者；他们不只是重复别人过去已经学到的东西。

我举一个例子。几个星期前，我9岁的儿子肖恩和我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做他的实验。肖恩(Shawn)想知道盐如何影响食物的味道。我们花了几天来阅读有关盐的书籍并猜想人们会对他们的食物中的盐做何反应。然后我们带着食物到他所有的朋友家。每个小孩都尝了放了盐和没放盐的食物——香蕉、苹果、汉堡和炸薯条——然后每个人对食物的味道给出一个数字分数。然后肖恩和我花了几天时间画结果图并寻找模式。最后肖恩将结果和他的预测做比较，并试图解释为什么人们会表现出那样的反应。他非常兴奋，因为他觉得自己是真的在进行科学研究，而不只是阅读有关科学的书。他觉得自己像个少年科学家！

后现代教育的策略

也许后现代教育改革最核心的特征是在共同体中学(learning in community)。当学生在共同体中学习的时候，他们将竞争放在次于合作的位置上。他们也将发展与和谐合作很关键的社会技能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由于这一原因，建立学习共同体在后现代教育改革中是关键性的步骤之一。作为一个共同体，他们有着共同的价值和目标。他们共同安排他们的任务；他们探究和讨论结果以便决定他们的结论；他们共同做报告。

华盛顿州的常青州立大学(Evergreen State University)是美国教育改革的先锋。当我在几所大学引领

教育时，我从他们的模式中收获甚丰。该大学的领导倡导学习型共同体；这种共同体成为以团队为基础的、跨学科的高等教育的典范。学习型共同体项目还研究社会问题，比如资讯的日益分裂、学生缺乏参与的积极性和学生的婚恋问题。通过强调在多种场合下的人际对话、合作和体验性的学习，这些项目研究强化了正在减少的团体感和联系，并让学生将自己大学阶段的学习与更大的个人和全球问题关联起来。常青州立大学运用的学习型共同体与其他后现代教育策略包括以下几点：协作和合作式学习；自我评估，鼓励批判性思维；讨论小组和研讨会；包括许多讨论环节，鼓励学生观察更深刻的个人反思，帮助学生自己找材料；以问题为基础的学习；不只是告诉学生解决办法；安排问题让学生解决。学生越能深刻地精通客观事物、保持的时间越长，他们就越能将它运用到现实情况中；“跨课程的写作”：学生的写作广泛，包括杂志、读后感和回应彼此的作品。当学生写他们自己的回应时，他们的学习更深入。而且，善于写作的能力对成年人的成功很关键。这一方法也可以用来作为一种策略，能够反映那些能自觉地将过去的经验提取出来的学习者在英语学习上更有能力、自信和更高效的。

同龄人互助教学：年长的学生作为指导者、导师甚至是那些目前不是很超前的学生的教师；服务型学习：学生参与共同体的服务，然后思考他们所学到的；经验式学习：课堂外的经验成为学习的焦点。这些包括服务型学习、出国留学、共同体服务和实习。它们也包括实验和田野考察；“创造性思维”：要求学生使用不同的范式来思考事物，而不只是用传统的框架来思考。鼓励他们创造性的帮助使他们成为灵活的思考者和领导者。

结论

我们已经谈了从现代范式向后现代范式的转变。后现代需要十分不同的教育方法。世界的变化更加日新月异。由于科学、商业和政府的变化，今天的学生需要灵活，他们必须善于解决问题，因为他们将面临新的和棘手的全局挑战。我在课堂上使用这些新的理念已经有25年了，目前正在根据它们来改革我所在的大学。在这个过程中，不仅学生的成绩提高了，而且老师的教学质量也有了提高，他们在其中发现了更多的乐趣。(本文为克莱顿校长2012年在哈师大召开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与中国的教育改革”国际研讨会上的主题发言。此处有删节。)

探索中国教育改革的另一种进路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教育改革”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哈尔滨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温恒福 杨丽 教授

为了深入研究和借鉴富有生命力的建设性后现代思想，探索兼具中国智慧又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改革之路，哈尔滨师范大学与美国中美后现代教育发展研究所、克莱蒙林肯大学、美国过程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与中国的教育改革”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2年6月8日至9日在哈尔滨大学召开。大会围绕“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教育改革”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提出了许多富有创造性的见解。

建设性后现代教育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积极力量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大卫·格里芬亲临大会，并做了“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教育：以生态危机为核心”的主旨演讲。他认为生态危机是比“核冬天”更严重的危机。生态危机无需任何人做任何事情，仅仅一切照旧，就能毁灭地球、结束文明。应当将压倒一切的心态问题作为教育的核心，教育改革要将教育置于生态危机的这个背景之中来设计与深化。他强调我们应当首先关注整个地球的身心健康。他认为已经签署了“京都议定书”、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目标的中国有可能成为拯救人类文明的积极力量。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另一著名代表人物小约翰·柯布博士向大会提交了《生态文明学者的愿景》的论文，创造性地提出了建设“生态大学”的主张。他说：“我们把希望寄托于中国。中国政府已经制定了建立生态文明的国家目标。然而可以看出，这个目标并不容易实现。建立生态文明的必要性在于要明确研究生态文明的含义是什么，以及如何实现生态文明”。他建议开展国际合作，出台建立生态大学的方案，他说“我们希望在近几年之内，各国之间能达成共识，出台建立生态文明大学方案。很有可能，一旦这个方案出台，对课程设置的需求将导致中国乃至世界其他国家高等教育的彻底变革”。美国学者伊万杰洛斯特·瓦连纳斯与柯布博士的观点相近，也主张建设“生态文明大学”，并进一步谈到了“中国的生态文明大学”，他认为，生态大学将传播生态文明的理念与生态生存的本身，将培养领导者如何制定各种公共政策，以帮助中国成为21世纪生态文明建设的典范。与会者普遍认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生态关怀，以及积极加强生态文明教育的主张，都认为这可能是从整体上深化中国教育改革的又一新的思路。

建设性后现代教育将有效地服务于社会变革

建设性后现代专家克里福·科布向大会提交了“从建设性后现代教育的视野看当代美国教育中的问题及其对中国的启示”的论文，他批评美国只专注于技术和考试成绩，而很少关注目的。主张教育要开始于整体，然后再看部分，要先思考社会，之后才是学校和学生。这种思维方式会让学生整合自己的知识，以理论联系实践的方式应对新情况，不再为了考式而学习。他说，改变教育就是改变社会，后现代教育的最根本的问题不是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学校，而是我们想要什么样的社会。要在努力改变社会的前提下来改变学校，并从改变学校的实际结构入手，将后现代主义方案融入到学校的课程和活动中去。在这一问题的讨论中人们进一步提出了三个相关的问题：一是积极有效地服务于社会变革是建设性后现代教育的本性之一；二是中国建设性后现代教育一定要扎根于中国的教育改革和社会变革之中，积极地汲取营养，并与之和谐地共生共长；三是建设性后现代教育的反思性、批判性、整体性、整合性、融合性、内在关系性、创造性与和谐共生性等特征对中国教育改革与社会变革具有许多新的启示。

建设性后现代教育是绿色教育

樊美筠和王治河博士主张“生态文明呼唤一种绿色教育”。如果说机械教育是现代工业文明的产物的话，那么生态文明则呼唤一种有机教育亦即绿色教育。从机械教育到有机教育的转变可以看作是教育史上的一场重大变革。第一，绿

(McCullough p. 52; Kim p. 26)

处在新时代边缘的中国有着令人羡慕的机遇去超越现存的技术文化，并着落在一种有着后西方(post-western)方案的准原始(quasi-pristine)环境。西方的方案正发出超出无条件的物质主义的顶点的信号。物流的瘫痪只是美国反城市散居带给人们的一大灾难。去改革这一局面已经太迟而太晚了。改革无法实现足够的转变，因为它只是改进错误，因此是走向一种可预见的死胡同。(Q14 p. 5)

西方已经在缓解城市的物流(交通)。但只要我们坚持超级消费模式和汽车的至高无上，这一冲突将无法解决。减少消费和增加三维的、多层的住房是避免城市的杂乱扩张的唯一替代方案。(McCullough pp. 45-46)

城市的这种重构也将意味着建造的模式和方法本身的重构。利用简约线性城市的水平连续一体性，建造过程将在大地上“铺开”，一次建造一层，然后不断地继续增加，像铺地毯一样，它的体积以高科技为基础，战略性地坐落于简约线性城市的连续统一体之中。建造的秩序和时机将适合于简约线性城市连续的、水平的层化(stratification)。(Q14 p. 4)

表面上看，索拉里似乎提倡重建的模式和线性城市突然地、一夜之间和一次性地在各地建造起来，但事实上她推荐的是渐进主义者的、反复试验的进路。他提出一次以一个单元来做实验和测试，第二个单元的建设将汲取第一个的经验，如此推进。第二步将是建立类似实验室的城市研究来致力于逐步解决城市问题，它作为城市问题所需的综合和系统方法的测试场地和可行性研究所。(Kim p. 24)

如今我们面临着环境上实实在在的、全球气候变暖和自然的灾害事件的威胁，城市的设计需要确保安全，以应对多种形式的自然灾害。简约线性城市模式能够使基础设施健全和合成一体，以确保即使是在紧急情况下也能输送和接收人群和物品(水、食物、电力和庇护所)，并实现地区的绝大多数群众运用城市的物流体系能够在半小时的事先预警中找到庇护所。这种健全的基础设施将大量的减少灾后的物资毁坏，和对人们装修的居所、人的生命、和城市文化生活(心灵的伤害是最大的后果之一)的大毁坏，并大量减少恢复的成本。(Q14 pp. 24-30)

索拉里认为，我们为以超级消费模式为特征的西方发展模式提出“简约的替代方案”是十分必要。索拉里称西方超级消费的发展模式是“不稳定的、不公正的和膨胀的”，而且“显然是不关心地球的公正和生物圈的和谐的”。(Q14 p. 25)他特别批评了北美人依恋于独户独院的居住方

(上接第3版)另一方面，简约线性城市在一定意义上将城市带到农村。人们可以想象，农夫们可以定居在一个完全城市化的地方，然后旅行到邻近的地方去耕作和种植食物。索拉里特别清楚地勾勒了中国的这一前景：中国面临着3亿农民——相当于美国的整个人口——抛弃土地去城市寻求生计和工作的问题。中国可以采用这个计划来将城市带到农村，而不是让城市被这些人口所侵扰。简约线性城市特意以有序的和自足的方式来嵌入和穿过大地。人们可以在农场工作而在城镇定居。(顺便提一下，这是一种古老的欧洲传统)。(Q14 p. 7)

鉴于中国已经在整个大陆建设一个类似动脉的铁路网，索拉里希望中国铁路技术上预先计划的投资将重构人类在地球上的存在方式，塑造另一种能与世界其他地区、甚至是发达国家相匹敌的发展模式。与拥抱与汽车交通相伴的城市的杂乱扩张、巨无霸、巨大的低效和浪费相反，索拉里希望汽车能和在中国作为新的大陆铁路网的一部分的、时速200到400公里的车厢边缘化。根据索拉里的简约线性城市思想，中国应该做的是平行地发展一个第二个类似动脉的系统与第一个也是首要的铁路网相连接，为越发想变得完全现代化、交通快捷便利和城市化的13亿中国人提供必要的交通服务。鉴于中国的移动人口是美国的4倍多，其规模将是巨大的。索拉里从进化的阶段这一角度来看其重要性：“鉴于中国的社会建设不可避免地引起的经济、金融、文化和技术创伤，向第二个类似动脉的系统的发展要求与目前正在发生进化的、第一个阶段要类似动脉的系统相协调和呼应。”(Q14 p. 7)

中国已经认识到建造所需的首要动脉的必要性；索拉里问的问题是，中国的设计者是否会采取下一个进化阶段，并认识到发展第二个网络系统的必要性，以便更全面地仿效静脉-动脉概念？索拉里强调的一个重点是，仅仅是改革城市系统和重构城市系统这两者之间的关键性差异。当一个城市系统在本质上已经机能失调和不协调时，它应当不是被“改革”而是完全重构。改革过于保守，属于营救性的，保留了太多的机能失调，因此产生的是索拉里所说的一种“更好种类的谬误”。仅仅改革难以应对现代的人类工业所产生的新情况的挑战。改革最多是试图改进现存的事物，而不是运用创造性的创新去形成一种全新的城市方案。

在索拉里看来，中国正好处在需要认清不可逃避地重构城市系统的紧要性的时刻，“目前的城市系统就其本身而言已经不再是协调一致的，而是在迅速走向不可预测、自我矛盾、不公正、毁灭、坍塌和报应”。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教育改革”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

# 世界文化論壇

## 南加州有个“桃花源”

——记帕莎迪纳的迷你都市田园

《世界文化论坛》主编 樊美筠

随着现代化大潮的长驱直入，随着工业化的挖掘机“伸出巨大的钢铁巨齿”从大地深处“控断祖先与我们血脉相连的脐带”，陶渊明已成“昨夜星辰”。随着一座座田园风光的乡村逐渐被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所取代。随着传统的农业生产已经被滥用的化肥、农药、转基因技术严重污染，“桃花源”更是成为一个关于失落的、破碎的农业文明的梦幻(鲁枢元语)。

相应地，许多美国人所热衷的开车、住豪宅、大手大脚的现代生活方式被演绎成唯一的时尚，尽管这种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是不可持续的。这种生活方式对人身心的奴役更是怵目惊心的，因为它使人失去了自由，成为动物的囚徒，以至于我们离现代化越来越近，却离幸福越来越远。

然而，自由是人类永远的追求，对这种奴役性的现代生活方式的抵抗，对美好“桃花源”的追求大有人在。帕莎迪纳市的德威斯一家就是这种自由战士。他们的迷你田园，堪称都市里的桃花源。这个普普通通的美国家庭，早在20世纪六十年代就开始探索一种简单绿色的生活方式，更于十多年前，将他们城市屋的前院后院，开辟成菜园，不仅如此，更在节水节电等方面成绩斐然，二十多年下来，除了水资源，他们基本上做到了自给自足，他们因此建立起来的都市田园成当地的一道靓丽的风景，他们的实践甚至走进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课堂，并被世界各地许多重大媒体如《洛杉矶时报》、《纽约时报》和家喻户晓的节目主持人欧普拉专题报道。

**德威斯一家**

帕萨迪纳(Pasadena)是美国南加州洛杉矶郡的一座名城，位于洛杉矶东北部，因其玫瑰碗和每年元旦日的玫瑰花车游行而闻名于世界。钱学森所毕业的著名的加州理工学院就坐落在此城。德威斯一家的迷你都市田园位于帕萨迪纳老城一英哩的地方，建立于1985年，屋主为朱尔斯·德威斯。他和大儿子贾斯汀、大女儿阿娜伊丝和小女儿约娜妮一同经营着这个藏身于城市深处的迷你家庭田园——南加州的桃花源。

德威斯一家的房子总面积为66’ x 132’ = 8,712 平方英尺(相当于1/5 英亩)，约809平方米，其中住宅面积为1,500 平方英尺，约139平方米。菜园

面积为3,900 平方英尺，约0.1 英亩(相当于363平方米, 0.6亩)。里面种有蔬菜、水果(苹果, 无花果、桃子、广柑、杏、枇杷、蕃石榴、菠萝和柠檬等)和浆果，共有350多种。在这不到一亩的迷你田园里，不仅“芳草鲜美，落英缤纷”，而且非常高产高效，所有的鲜花都可食用。现在田园的年产量为6000磅左右，相当于5450斤左右。同时年产2000多个鸡蛋，25至50磅蜂蜜。

**种的是自由**

德威斯认为，现代世界越来越依靠超市、大公司、石油和政府。现代人过的那种朝九晚五的生活，在他们看来，不过是使人成为支付每个月账单的奴隶而已。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又必须寻找工作机会，为他人打工。对于物价上涨，你完全无能为力，只能无时无刻的担心，明天是否又上涨了？如此，哪里有真正的自由可言！

相反，德威斯将自己的生活方式称之为真正自由的、独立的生活方式，因为你当自己能够自给自足时，你就不需要象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那样依赖市场、依赖公司，不需要象朝九晚五族一样担心物价的上涨，不需要看老板脸色行事。你知道你吃的每一种蔬菜和水果来源于何方、是否健康。这就是为什么德威斯一家将他们的网站称为通往自由之路的原因。显然，德威斯一家的分明不是蔬菜，而是自由。

**自给自足的绿色生活方式**

德威斯的父亲为标准石油公司工作，但他自己却选择了一条与其父亲截然不同的生活道路。早在1969年，德威斯就开始寻找一种有意义的、自然的、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这时他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实践一种简单的生活方式，所以，在他当时的生活中，他尝试过没有空调，烘干机和洗碗机的生活，所吃食物为全麦及非加工的，同时也尝试着自然的医疗。

这个传统德威斯一直坚持下来了。他曾经在新西兰和佛罗里达居住，1985年至今则住在帕莎迪纳。他们居住的房子建于1917年，他们的生活方式看起来似乎和他们的房子一样古老。所有室内家具不是从父辈继承而来，就是二手货。在他们的饭桌上，放着石蜡做的台灯，尽管他们并不经常用它。以至于在

很长一段时间他们的邻居认为他们晚上不在家。他们的客厅是粉色的，虽然家具很古老，但却令人感到很舒服和惬意。窗框则是用老的床架和纸做的。

他们放弃了许多美国家庭认为是生活必需品的东西。他们家里没有空调和暖气，但在客厅中央有一个烧柴的烤炉。他们在冬天有热料，但晚上使用睡袋保暖。家里有一个老电视，三台电脑。只有一只手机作为紧急情况时用。

他们虽然住在城市，但却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餐时间是五点，午餐是九点半，下午三点半是他们的晚餐时间。晚餐后再工作五个小时，然后看电视或网站更新及管理的事情。他们一周工作六天，周六休息。儿子贾斯汀是经理和送货员，每天都要记录当天的天气，用了什么有机肥料。阿娜伊丝则象家里的妈妈一样，负责清洁、采买、煮饭等；一家之主朱尔斯则大概是在做他的PPT，用于大学和媒体的演讲等；约娜妮则在写电脑程序，更新网站。她是无师自通的。每天早上，他们的电邮都堆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邮件，所以，他们每天都会抽出一些时间来回复邮件。

他们的厨房用具，惟一样需要使用电源的是冰箱。其它的厨房用具如果榨汁机等都是手动或脚动的。他们经常在室外的太阳能烤箱里做饭。现在，他们所使用的电力全部来源于屋顶的太阳能。

水大概是他们唯一需要依赖外界的自然资源了。南加州缺水，所以，他们可说是殚精竭虑地节水。他们每年所用水的百分之九十被用于农场和动物了。朱尔斯开玩笑说，他们的鸡生活得比人好。

而他们在室外的，则是每周淋浴一次。夏天则是将自己利用太阳能的淋浴室里淋浴，用后的水则直接进入他们的农场里了。他们所用的香皂及洗发香波等都是天然产品，可以在地里自然分解，对植物没有任何伤害。他们只在必要的时候洗衣物。当然，他们家里没有烘干机，洗好的衣服都是在晾在室外自然干。

他们有一辆1988年出产的柴油车，所需燃料是他们用从附近饭店搜集来的免费的废弃食用油转换成的，将废弃的食用油转换成一加仑柴油只需要一美元的成本，转换的机器是儿子贾斯汀用的热水水器再加上一些水管和桶做成的，技术是他们在网上自学的。甚至他们

食用的面粉也是他们自己磨出来的。

总之，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他们决不买他们根本不需要的东西。坚持重复使用，坚持回收。如果能自己做的，就自己做，实在不能自己做的，如电力、水等，他们就尽量节约，并用绿色能源。他们的观念是将绿色生活建立在使用尽可能少的绿色能源之上。

他们的后院有鸡鸭和山羊，但他们都很干净，根本没有一般动物身上的那种怪味。许多人总认为有动物的地方就很难闻。但约丹妮解释说，他们的动物因为吃的东西里没有化学品，没有添加剂等，所以不会有那些怪味道。他们和这些动物有很好的沟通，感觉它们就是德威斯家的成员。每次周六外出远足时，约丹妮都会带着那两只可爱的矮脚山羊。

他们和他们的动物一样，都过着一种简单却健康的生活，所以，他们很少生病。他们同时认为，是药三分毒，而且害大于益。如果他们生病了，他们就利用阿娜伊丝做的瑞典苦味酒，利用身体本身的抵抗力。如果动物病了，约丹妮发明了一种包含厨用苏打和酸奶的东西来治疗动物肠胃方面的问题，用山金车按摩来治疗鸭子腿抽筋。

2001年，当地的报纸报道说，转基因玉米被用于动物饲料，这些肉类进入了当地一家快餐店，而他们经常在那里吃饭。这使他们意识到，他们不能再相信外面的食物了，必须吃自己生产出来的放心食物。

现在，他们农场的年产量可达到6000磅，可以满足他们一家百分之八十的需要，即使在冬天，也能满足百分之五十的需要。他们甚至有許多富裕的蔬菜出售给附近的饭店和一些宴会。他们的奶类则来源于后院的鸡鸭和山羊。当然，他们也有自己不能生产的东西，主要是小麦、米、食用油、糖、黄油等。这些他们还需要到外面去采买。他们不需要肉类，因为他们都是素食主义者。这个家庭送你农场每年可带来4万美元左右的收益。

他们的种子是自己培育出来的，而不是来自于臭名远扬的孟三多种子公司。

曾几何时，德威斯的观念在外人看来是很奇怪的，他家前院都是绿草一片时，他家的前院却鲜花盛开，而且所有的鲜花都是可以食用的。这也使当地的居民感觉很困惑。他的孩子们在童年

时代经常因此和他们身上的二手衣服而受到同龄人的嘲笑。当大多数孩子进入学校学习时，德威斯却在家自己教育他们。要知道那时在家教育是非法的。许多孩子甚至因此认为德威斯的孩子们很笨，因为他们没有受到正规的教育。然而，时代变了，今天，德威斯的观念受到人们和社会的普遍认可。他们的与众不同成了时代的潮流，当洛杉矶时报对他们进行的专题报道发表后，他们的邻居更深刻以他们骄傲和自豪。他们自己则更是对此感受颇深。

阿娜伊丝说，当他们童年时代的一些朋友混迹于帮派，将自己的生活搞得一塌糊涂时，他们则感到非常自信，认为自己能解决所面临的一切问题；我们的朋友需要上课学习如何做事情，而他们却无所适从，在干中学。

**渴想找个农民**

德威斯一家看起来和一般的美国家庭不一样，三个已经成年的孩子仍然住在一起，而且都没有结婚。但当有记者问到这个问题时，阿娜伊丝和约丹妮两姐妹说，我们都想找一个农民，但在洛杉矶地区，要找到一个真正的农民实在是太难了。为了孩子们的婚事，一家之主朱尔斯每周都会组织郊外的野外活动，邀请一些有兴趣的青年人参加，扩大三个孩子的社交圈。这些活动一分钱都不花，因为所有的食物和饮料都来源于他们的农场，很有机、很健康。其实，德威斯有四个孩子，除了阿娜伊丝、贾斯汀和约丹妮三人留在家庭农场干活外，他的第三个孩子杰瑞米几年前离开了，因为他想融入现代社会。尽管如此，留下来的三个孩子却很自信，很高兴，因为他们感觉自己过的是一种有意义的生活。面对眼前这两个一脸灿烂的希望嫁给农民的美国女孩，我不由地想起现代性对农业和农民的污名化，以至于一些拒绝嫁给农民的都市女甚至扬言：“远离毒品，远离农民”。比起这些中毒的都市女，阿娜伊丝和约丹妮两姐妹是幸福的，因为她们生活在与自然的和谐之中，因为她们知道自己要什么，并从中找到了自己生命的意义。相信她们也一定能找到自己如意郎君，那一定是热爱桃花源的人。

**未来的计划**

德威斯应该是美国第一个生产自己的食物、且自给自足的家庭。他们因此

## 倾听通灵者的言说

——读鲁枢元教授的《陶渊明的幽灵》  
 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外文系 韦清琦

现代社会如何走出这一困境，人们有可能求助那些过往的幽灵吗？——鲁枢元

你能在脑海里，把鲁枢元先生与一位流徙的通灵者联系在一起么？若是这显得有些不尊重他的话，那你不妨想象一位当代文艺学者对一个死去1600年的诗人的幽灵的苦苦地呼唤与寻觅，接下来是精神隧道里的邂逅，霎那间某种近乎永恒的东西像电火般嘶嘶亮起，辉煌，凝聚，却又照例无奈地被隆隆的现代厉风渐渐冲淡，终止于消湮。精神在意识中的邂逅，总是这样转瞬即逝。好在一本书留驻了手。

之所以敢用这样的语言来表达《陶渊明的幽灵》读后的感受，是因为成书之际我带着先生走出喧嚣的南京市，在江心洲采食草莓，他赞道“超级好吃！”这种远不够大师级别的儿童用语使我意识到，先生一边在使用语言一边又试图从中突围。总似乎有什么在牵着他向外走，向后走，向原初的地方走，那儿有幽灵的深邃目光在明灭中闪烁。

使我对于言有着神经质的别样认识的尚有另外的因素。先生对我有将此书译成英文的期许。重任在肩，我的阅读便有了更多的考虑。比方说，将道家译成Taoism的通例，在此书中将不得不改为Daoism，以区别于陶姓，冥冥之中Tao在英语世界和“道”有了如此直接的缘分。再比方说，“元问题”在书中被与英文meta-question作了严格的区分，因为后者强调“抽象化”、“逻辑化”，而前者则在乎追本溯源，因而“元”字，在找穷的我，看来要保留其拼音形式了。或许这本书的书写、翻译以及作者的心思，注定了是要超出常规定则，超出时代的，无论是落后于时代还是领先于时代，总之它有了那个不散的幽魂，眼下的世界架构与审美形式，就至少不是最可爱，必须要突破，要嬗变，要回望，要跳脱出来为那个冥界的古人招魂！陶渊明显然是本书的主角，但这里面醒目的旗帜并没有遮盖住作者宽阔的视野，其中最值得论说的还是跨中西与跨学科的研究路径。大凡进行中西比较文化研究时，更注重两者的异质对比。例如中西自然观，前者强调天人合一，后者更着眼于二元对立。鲁先生也重视中西自然观的对比，的确在这样的比较文化语境中才能凸显陶渊明无论在共时还是历时的世界意义。在第一章“元问题”部分对自然概念的探讨时作者说：“相对于西方，中国人对于‘自然-人文’同一性的发展，却使中国社会长时期处于缓慢、原地徘徊的状态，终至被当作‘愚昧落后’的典型。”这里，对中西暗含着锋铓，加了引号的“愚昧落后”为后文的陶渊明埋下了伏笔。作者就是这样的通过对比入手层层剥开人类驳杂而浑厚的自然观的。但我倒是觉得，特别值得深思的是本书的跨文化视野也很留意中西文

化尤其是在两者的源头相对而言近乎普遍的观念。例如中国古代的天人观就并非铁板一块，亦出现过以荀子为代表的物质化的、类似物理性自然的“天”，而“人为”的作用可“骋能”，“理物”而至“制天命”。作者由此发问道：“中华民族如果从那时起就丢弃孔孟、老庄而选择荀子道路，那么中国有可能率先进入工业社会吗？人类的工业化进程如果从两千年前就开始启动，今天的地球该是何种情形？”(45) 这的确是一个我们不太敢想像的问题。而与其如此空谈，不如反思一下在我们这个孔孟礼仪之邦，这个虽然孕育了道家思想但鲜尊其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文明古国里，如今岌岌可危的精神与物质生态系统，是否早已内含着人类共有的“劣根性”，以至到近现代便可与现代性一拍即合？另一方面，西方文化中也不乏“道”的种子，鲁先生列举了西方古哲的种种朴素的有机整体世界观。譬如，芝诺“把自然与人的德行联系起来，认为‘按照自然而生活，这就是按照德性而生活’，这与老子《道德经》中的倡导就非常接近了。”(44) 这在他赞谈现代西方自然写作时亦是如此。

缪尔体验到的这种“物我两化”的境界就是老庄哲学中的“天人合一”；而“万物在歌声中节律性的运转”，正是陶渊明的“纵浪大化中”，那“一日千年、千年一日”的肉体永生”不也就是道家经典中孜孜以求的“神仙”境界吗？从人类的天性上来看，西方人与东方人、现代西方人与古代东方人竟还保留了如此相同的诗情体验与价值认同，这不能不让我们深受鼓舞！(32)

可见中西自然观本就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作者的写作姿态本身从一开始就避免落入二元对立的窠臼。或许我们在做任何一个领域的比较文化研究时，都应该有此开阔的心胸和健康的生态化思维。

也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视野中，陶渊明得以“重新”推出，因为“西方‘后现代’哲学家们‘回到前苏格拉底’的呼声”日益高涨，也因为他们在反思现代性时“往往会从中国古老的学术资源中取取援助”(49)。同时我也猜度，鲁先生此时召唤诗人陶渊明诗人之魂现身，不仅是为了国人，更是为了整个地球人啊。

书中指出，陶渊明不只属于道家或儒家或佛家，而是“中国传统自然哲学精神的化身”(52)，而在后现代语境中，自然哲学无异于“朝着人文方向迈进的生态学”(53)。因此鲁先生的陶学，也即生态学了，这样的跨学科视野中出现的陶渊明，也能以独特的亮相方式使读者耳目一新。许多做生态批评研究的人喜欢说某某古人的生态思想，此表述极易抓住“关公战秦琼”的把柄，或合乎逻辑的路径便是从先哲的自然观入手寻求其与现代人生态思想的契合，而本书确也是个很好的例子。

在生态哲学的视野里，陶渊明已

经不止是一位东晋自然诗人，而是自然智慧的一个符号，是诗人诗意地栖居于世的一个代表。陶渊明也不仅是中国人，不仅是古人。你看他独自负手而立、与之并肩的却不乏哲界界的伊壁鸠鲁、海德格尔、卢梭，诗界的精英里尔克、荷尔德林、华兹华斯，还有散文家梭罗、小说家沈从文。他们似乎全都踉跄独行在时代的后面，他们的身影却又在什么时候倒映在时代的前方。问题的关键或许是你怎么看待进步与退步，落后与先进，保守与发展，这里我尤其喜欢鲁枢元先生在谈到某些“陶渊明式人物”时所作的评论：“这些人(沈从文、卢梭)即使对于自己的生命，也没有发展进步的观念，他们的生命轨迹不是直线的、匀称的，而是循环的、周而复始的，一直到老，仍活在生命的原则。然而那又是一个制高点，人性的制高点，许多人拼搏一生也不能企及的制高点。”这也应该就是老子所说的“复归于婴儿”。

我们不知道如今还有多少“潦倒”的隐逸者还在陶渊明幽灵的庇护下执守着那个原则，如今我们更多看到的，是他们太热衷于用外在的物质拥有来衡量一个人的制高点。其实，在这个知识丰富得夺人眼球的时代，已经有许多相当富贵起来的人士开始回味、理解乃至羡慕起陶渊明式的散淡人生，然而他们进步的、成熟得已无法回避到儿童的童真、童心的清纯；与自然的隔膜也只能让其“回归自然”的心愿落实到高尔夫球场的果岭之上。对于他们，对于我们大多数现代“文明”人，陶渊明、卢梭、梭罗、沈从文们的制高点，几乎成了彼岸世界的幻影。

借助《陶渊明的幽灵》书中类似通灵者的言说，我们在一个世界文化的天幕上看到了那些亘古不朽的幽灵。然而作者的气并不仅仅在于幽魂再现，而是如同先哲金岳霖所说，要“以圣人来救治英雄观”，用“陶圣人”悠然见南山的田园吟诵拯救英雄们铁血与烈焰交织的进程曲。而对于文学、文化批评而言，最方便策略就是重构文学史了。该书后半部分的重心便是以陶渊明的诗为坐标，悉心重述“自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价值、意义及其演替的过程。我们可以从中看到，陶渊明的现代悲剧，大致与中国文学史撰写的坎坷历程同步。实际上陶渊明之死——更准确地应该说陶渊明精神的死去——折射出的正是中国文学中诗思的式微，自然之魂的陨落。

无论是对现行文学史书写的审视批判，还是陶渊明幽灵的呼唤安顿，《陶渊明的幽灵》一书都试图努力做到站在自己民族的文化积淀之中，展现国际化与生态学的视野。不少批评家尤其是生态批评家都不会放过对现代性的批判，而“现代性”在很多学者的眼里又总被列于西方的“舶来品”，但鲁枢元先生却在书中写道：明清以来，陶渊明在诗坛地位的跌落，与其时诗歌整(下转第4版)

【编者按】**保罗·索拉里(1919-)**是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他曾是现代建筑之父、美国著名建筑学家赖特(Frank Lloyd Wright)的高足。在其60年的职业生涯中，他获得许多重大国际奖项。20世纪60年代开始反思现代城市化，提出生态城市的观念，并在亚洲亲自建“阿柯寮地”实践其观念，因而被誉为“生态建筑之父”。

和世界的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在快速城市化的同时也面临着自然和能源资源有限、农业生产有压力和环境退化的问题。目前中国40%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到2025年，城市人口将增加3.5亿，中国的城市人口将达到10亿。由于中国城市在向上发展的同时也向外扩展，城市化消耗了大量的农村地区。在过去的30年，中国城市的“摊大饼”模式吞噬了约四万五千英里的沃土。这种杂乱无章的扩张也产生了对汽车的需求。中国本国的汽车市场现在已经超过美国。如果中国人均也像美国那样拥有汽车，那中国的汽车将超过10亿辆。

这些现实向中国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如何能够以高密度和物流便捷的方式密集地和快速的城市化——最小地消耗农业用地、能源和其他重要资源——同时能把城市建设为社交上和文化上都很丰富的居住地？这需要城市在双重意义上都是“可持续的”：尽可能使浪费最小化，同时使品质最大化以使城市成为富有生机的地方以实现美好的生活。这些包括经济机会、文化的丰富性和激发人际交往。

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生态建筑之父、美籍意大利建筑师保罗·索拉里一直致力于设计可持续的、高密度的、三维的城市来容纳大量的人口——从十万到数百万——同时实现浪费和杂乱的城市扩张的最小化。值得庆幸的是，事实上，浪费和杂乱的扩张是连在一起的，因此最小化其中一个也会最小化另一个。索拉里将他的城市概念命名为“生态城市”(arcology)，它清楚地表达了建筑和生态的融合，他因他的开创性著作《生态城市：人类设想的城市》(Arcology: The City in the Image of Man, MIT Press, 1969)而闻名。在他最近的著作中，索拉里解释了生态城市这一概念的含义：

与追求城市的杂乱扩张相反，生态城市的概念提出一种高度整合和紧密结合的三维城市，城市的杂乱扩张内在浪费土地、能源和时间，倾向于使人与人之间和生活相孤立。在生态城市中，建设的环境和居民的生活进程之间像有机体、动植物组织和细胞在一个高度进化了的有机体中所做的那样互动。这意味着多种多样的系统一起工作，其协调和整合使浪费最小化，同时使人和资源的高效流通最大化。运用多用途的结构、开拓以太阳能为主导的照明、供热、冷却和食物生产以及审美价值的最大化。

现代城市化使农田变成了停车场，造成能源、空间与时间等方面的大量的浪费。索拉里的建议则是，城市向内聚集而不是向外扩张。城市与生命进化的指导原则相一致。这些原则是白足、精密的物流、缩减浪费(精益工序)、与“外界”

互动、进程丰富多彩、自力更生和孕育内核，即城市的风貌。

自2004年以来，索拉里一直专注于发展简约线性城市(the Lean Linear City)项目，他最初在大脑中与中国构想出一座城市计划。这一项目发端于2004年他应邀参加“中国-澳门”会议，并在会议上介绍一种城市概念。几年之后的2009年，天安时间当代艺术中心(the Beijing Center for the Arts)委托索拉里提供一个可以容纳人口迅速膨胀的城市规划，比如北京。索拉里的计划，即“简约线性城市”于2009年11月在该中心展出，称为“3D城市-未来的中国”；简约线性城市提倡沿着网状连接的物流系统过道进行紧凑的、密集三维发展。

简约线性城市采纳生态城市的理念，并将其延长为一个“旅行的”城市，一种三维的城市连续体纵横交错在大陆上，相互连接着主要的城市中心。简约线性城市的提议渴望，至少是潜在地，成为横贯大陆的城市网，将数百公里的人们联系起来，建立一个双向的物流桥梁以便个人的、职业的和文化的互动。

索拉里将其这一计划的特征描述为“似动脉的”(“arterial”)生态城市，让人联想起有机体中的动脉和静脉在流通系统中几乎是神奇般地喂养、清洁和支撑身体，将极为重要的物质输入、回收或者除去垃圾，并支撑新的增长、再生和创造性。正如动脉和静脉支撑有机体的生命功能，物流运输体系和简约线性城市的过道便利了城市居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与有形的有机体相比，我们城市的物流系统的递送和回收工作完全是粗陋的：不畅通、低效和不可接受地浪费。

在有机的线性结构中，身体的每个细胞由动脉和静脉令人震惊的对称网络来喂养和清洁。数万亿细胞通过一种无法模仿的输送和回收系统、如蛛丝般的网状组织来保持生命力和工作状态。我们数量庞大的汽车，很快会超过60亿辆，永远无法那怕是仅仅接近任何有机体的完美物流。而且，一种基于汽车的文化导致居住地的分散，这不可避免分离了人并窒息了真正的新颖性、窒息了文化和文明的协同作用。(McCullough, p. 46)

索拉里认为，我们需要真正地重构(reformulation)人类的存在方式，人类的生态学，这发端于我们最基本的需求：居住的场所、食物和交通。这是简约线性城市的指导原则，它对城市的复杂性、物流的效率 and 食物的生产都有重要内涵。基础设施中需要进行彻底重建的最大部分是物流和对生活各方面的深远影响。其结果可能是，人类的居住地需要根据物流网络重新安排。这要求城市带(urban ribbons)宽度适中，使城市有两条平行的公路，诸多循环路径，诸多公共交通服务和地方的、地区的以及大陆的火车站。(Kim p. 30)

将城市称为“简约的”是为了将城市建设成在资源、能源和时间上浪费最少，同时最大限度地在当地生产太阳能能源(风能、太阳能和温室)。“用更少的资源办更多事情”是索拉里的简约信条。城市类似于动脉这一点突出了简约性：即物流效率使城市社区的获益最大化，同时

使不必要的自然和人类资源的浪费最小化，比如交换物品过程中所浪费的时间。

简约线性的、似动脉的城市可以根据它的三个明确的功能来概述：(1) 似动脉的物流内核，它强调流动性。(2) 骨骼内核，它的个开发是为城市提供保护性的宜居结构并特别利用太阳能资源；(3) 这些系统支持丰富多彩的和不断演进的文化创新。这三个方面结合在一起组成了索拉里所说的城市这一超级有机体的生命。用索拉里的话说，“简约线性城市提出了一个更合理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都市生活、能源生产和物流在其连续统一体中紧密结合。”

简约线性的、似动脉的生态城市提出一种密集的 and 连续的城市带，它由相互连接的、充分利用地区的风能和太阳能、光伏发电和温室的城市单元(module)组成。通过整合市区内交通使居住地与物流渠道“相一致”；即超级物流内植于超级城市的结构内。(Q14 p. 1)

似动脉的内核由运输地铁组成，从人行道、自行车道到当地的地铁和高速磁悬浮列车。这一物流通道确保以无汽车的方式集中利用空间，使一个密集的和充满活力的城市能够首要地建基于步行者。

骨骼内核是灵活的结构形式，它为似动脉内核提供住房、保护和部分地给予它能量，同时，骨骼内核的横切面宽度规定为200米，居住地沿着骨骼内核向外扩展并提高密集度。能源的生产通过风车、太阳能电池和利用温室以及废热的加热装置来进行，骨骼的连续统一体在能源生产中起着重要作用。这一多层次结构使居民们应对极端的灾难，比如地震、洪水、飓风等提供保护。这一连续的线性过道由一些单元构成，如同脊柱上的椎骨，每个单元200长、200米宽，高度近100米，这一大小确保了适合当地的行走。每个单元内部的设计都是独特的，同时仍然增进城市的密集性和其居民的三维活动，不费力的近程步行带来了便利和机会。

第三个方面是在众单元内所形成的文化生活的多样性，每一单元都有一个完全独特的位置。每一单元都根据地理的、生态的和文化的背景来自主决定自身、它的工业、文化和文化重点和偏好。随着居住的团体采用和适应简约线性城市的单元作为生活、工作、创造、交换和繁荣的地方，将他们的生活建基于结构上类似于动脉的内核所提供的潜在可能性上，独特的地方文化便产生了。随着城市跨越不同的气候和地理区域，人们可以想象在形式和文化上的无数种单元的变迁。

尽管单一一个单元可以居住3000居民是相对有限的，但一个充分发展的、数十或数百千的简约城市带将可以提供一很大的、富有技能和多样化的劳动力市场。随着基础设施体系横跨整个大陆，简约线性城市将线性地发展，在人口密集区与其他简约线性城市相连接。(Q14 p. 16)

我们也认真考虑了这一城市建设对农业和食物生产的影响。一方面，在高密度的城市过道中的密集人口节省了因城市的杂乱扩张所占用的未开发土地，使它们能够被用于农业，娱乐健身和作为荒野(作为大量物种的栖息地)；(下转第2版)

